中国国家图书馆西文编目规则的嬗变与开新

蔡 丹 罗 翀

摘 要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积淀,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西文资源馆藏宏富且体系完整,与馆藏建设同步发展的还有文献资源的信息组织工作,而信息组织标准化的核心是制定科学的编目规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中国国家图书馆西文编目规则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零散到体系化,从“拿来主义”到有机融合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务实”和“创新”是谋求发展的两大根本要素。文章以西文编目规则的发展演变为纲,按时间脉络梳理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在西文编目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明确了新形势下西文编目规则的未来发展路向。参考文献12。

关键词 中国国家图书馆 西文编目 编目规则 历史 发展

On the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of Cataloguing Rules of Western Language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ai Dan Luo Chong

Abstract: After a little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f accumulatio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as a rich collection and a complete system of Western language resources. It is th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of resources that develops synchronously with the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The core of standardization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is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cataloguing rule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cataloguing rules of Western languages have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from fragmentation to systematization, from “bringism” to organic integration. In this process, “pragmatism” and “innovation” are the two fundamental elements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ataloguing rules of Western languag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the cataloguing of Western languages in the context of time,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ataloguing rules of Western languages in the new situation. 12 refs.

Keywords: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Cataloguing of Western Languages; Cataloguing Rules; History; Development

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对西文文献的收藏肇始于20世纪初期,当时因接受外国友好人士的赠书而引入了西文馆藏。20世纪20年代,合组①前的北平北海图书馆(下文简称“北海图书馆”)已经非常重视西文图书的采访,至合组时已入藏西文文献6万余册,涵盖外国政府出版物、参考工具书、整套专门杂志、英国文学、音乐美术图书、考古学重要报告等,奠定了当今国图宏富外文馆藏的基石[1](41)。随着馆藏量的增长,文献编目工作日益受到馆方重视。1929年,合组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机构设置进行重大调整,编纂部下设中文编目组、西文编目组、索引组,专门承担西文编目工作的常设机构由此诞生,为相关业务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此后90年间,国图的机构设置虽几经变迁,但西文编目组始终作为重要的基础业务科组被保留至今。除组织保障之外,编目规则的发展也是关系到编目事业兴衰的核心要素。百余年来,西文编目规则在

① 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成为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DOI: 10.13666/j.cnki.jnlc.2019.0506

不断地继承和创新中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零散到体系化,从“拿来主义”到有机融合的发展历程,“继承”与“创新”体现了国图一代代编目员务实开新的敬业精神。从狭义上讲,编目规则主要指由著录规则和检索点选取规则构成的编目条例,广义上则还包括分类标引、主题标引和格式规则等。各类规则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彼此交融的。为便于表述,笔者以编目条例为纲,兼顾其他规则的情况,按时间脉络对国图西文编目的历史与成就进行回顾与分析。

1 起步阶段——务实的“拿来主义”(1949 年之前)

1.1 西文编目规则的初立

如前文所述,北海图书馆对西文馆藏建设十分重视,西文编目业务也因此获得了相应发展。当时,北海图书馆西文编目模式仿照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LC)的做法,在编目规则上完全“照搬套用”,遵循的是 1908 年由英美两国联合出版的《编目条例:著者和题名款目》(*Catalog rules: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史称《AA 条例》或《AA1908》。除编目规则外,分类遵循《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LCC),书次号则采用针对西文姓氏的《克特著者号码表》。1929 年,北海图书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在机构调整时设立了专门的西文编目组,作为编目工作规范的《编目部西文编目组办事细则》由此出台,但基本上沿用原有规则,并无创新之处。

合组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决定将馆藏目录全部改用卡片目录,以建立全馆统一的目录体系。卡片目录按照分类、著者、书名及排架各一套的方式进行组织,并以书本式目录作为补充。1929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启动了北平市各图书馆馆藏西文书籍联合目录的编制工作,由西文编目组具体负责,耗时一年半告成,并编制出版了《北平各图书馆馆藏西文书联合目录》。该目录汇集了北平市 29 家图书馆及学术机构所藏西文书刊 10 万余种,著录项目包括著者、书名、出版年月及所藏单位等[1](51)。除此之外,西文编目组还完成了数批专项图书的整理编目工作,出版了多种书本式目录[1](83),如 1932 年秋印行的《穆麟德遗书目录》,1934 年出版的《馆藏法文书目录》,1936 年出版的《馆藏西文期刊分类目录》。此外,按不同学科内容编制的专题目录也层出不穷,如 1932 年出版的汪长炳《馆藏西文参考书书目》、1936 年出版的《馆藏图书馆学西文书目》和《馆藏中国问题西籍分类目录》,这些书目在分类上依照 LCC,书末附有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等。1937 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图各项业务均遭受了重创,打断了西文编目工作繁荣发展的势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步得以恢复。

1.2 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西文编目规则最大的特点就是“拿来主义”,著录、标引、排架等基本都套用 LC 的规则。当时,LC 遵循的是《AA 条例》,因此,尽管这一阶段的馆内业务规则没有文档留存,后人仍可通过《AA 条例》从侧面探悉当时国图西文编目规则的大体情况。《AA 条例》绝大部分篇幅对主要款目标目及其形式的选取进行了规定,其他条款则简要说明了题名项、著者项、出版项、稽核项等的著录规则。“拿来主义”是务实思想的体现,也是在当时社会现实条件下开展编目工作的最佳途径。直接共享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成果,大大节省了国图建设中的人力和物力,而且 LC 编目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广泛、模式成熟,国图在引用其西文编目规则的过程中能避免很多弯路和不必要的争议。

西文编目规则上的“拿来主义”还引发了近代中西编目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开启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编目工作[2](125)。首先,在西方编目思想与方法的启发下,我国注重内容编目的传统书本式分类目录逐渐被注重索引且方便检索的卡片式目录所替代;其次,西方编目理论的引入使我国传统目录学分化出图书文献分类、著录、主题标引等不同领域,更能适应由以收藏为主转变为以

利用为主的藏书机构的编目需求;再次,西方编目理论不仅为我国图书馆西文文献编目提供了便捷的组织方法,而且对我国本国语言文献编目工作的实践和目录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稳步发展阶段——对本地化的理性思考(1949—1965)

2.1 西文编目规则的本地化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新中国的万象更新也反映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北京图书馆各项业务全面恢复,西文编目工作也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图书馆界在编目规则方面已经不再是完全的"拿来主义"了,而是开始对编目规则本地化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这是深刻认识编目工作、编目技能日臻成熟的必然结果。

2.1.1 《ALA 1949》和《LC 1949》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7年,北京图书馆西文编目工作仍然以参照LC编目规则为主。与新中国成立前不同的是,LC已不再遵循《AA条例》,而是采用其升级产品《ALA 1949》和《LC 1949》。《ALA 1949》(*ALA catalogue rules for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 2*nd edition*)是对《AA条例》的第二次修订,仍是关于款目的选取及其标目形式的规则,而不是一部完整的编目条例,因为它不包括著录规则。《LC 1949》(*Rules for description cataloging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则给予了著录方面的补充,是关于描述性著录的规定,阐明了"描述性编目"的原则,倡导在原则指导下给予编目员较大的自由度[2](34)。前者是款目和标目的规则,后者是著录的规则,二者需配套使用才能满足完整编目流程的需要。

2.1.2 《西文图书编目暂行条例(草案)》(1958)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西文编目工作主要依据上述两个文本,但由于条例本身过于繁琐且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因此亟待出台本地政策以对具体做法进行明确和统一。1958年,北京图书馆编制了本地化的西文编目规则——《西文图书编目暂行条例(草案)》[3]。该条例共21页,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对著者项、书名项(包括版次)、出版项、稽核项(包括页数、图表、书型)、丛书项(题上项)、附注项、主题/分类号/片号七大项目的著录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第一项"著者项"内容最多,占据近一半篇幅,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个人、团体标目在不同情况下的著录形式,其他六项则规定了文献客观描述以及标引方面的做法。可以说,该条例是对《ALA 1949》和《LC 1949》的一个提要式融合。

2.1.3 《北京图书馆图书著录条例(草案)》(1959)

1959年底,北京图书馆以油印本形式发布了《北京图书馆图书著录条例(草案)》。该条例是为适应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环境,把分歧较多的中文、俄文、西文和东文(日文)等主要语种图书的著录条例统一合并的结果。该条例共193页,分为总则、基本著录、补充著录、丛书/多卷集/连续出版物著录和附录五个部分。由于涉及不同的语种,该条例在编制时确定了六项编制原则[4]:(1)以中文著录条例为主,吸收"俄文"图书著录条例和其他条例的特长;(2)各种文字图书的著录尽量求同,但也要照顾其特点;(3)规定尽量求详,以便使用时有伸缩余地;(4)除了基本著录外,必须丰富和充实"补充著录"和"丛书/多卷集/连续出版物的著录",以期完整;(5)在文本和附录里必须引用各种文字的著录格式,以便著录时有所遵循;(6)附录必要的用语(用各种文字对照并用中文说明其意义)、索引、外文缩写和简称等,以便参考。

2.1.4 《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1961)

1958年,在"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西文图书目录卡片联合编辑组"即西文图书统一编辑组在北京成立,并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代管[1](191)。在西文编目规则方面,包括北京图书馆在内的北京各图书馆均以西文图书统一编辑组的规则为准。为使统一编目工作能顺利进行,编辑组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编辑适应我国需要并能为行业共同采用的著录条例[5]。经过近三年的努力,1961年,由编辑组编制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由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条例共 222 页,所依据的还是《ALA 1949》和《LC 1949》两个条例,仅在具体项目的著录上做了一些局部的修改和本地规定,在著录原则上没有变动。除著录条例外,西文图书统一编辑组在面向北京各图书馆发放卡片目录时所依据的相关规则主要包括:卡片分类号以《中小型图书馆分类表》的类号为主,同时根据订户需要,分别标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等三种类号中的一种,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卡片上标引主题标题[1](194)。

2.2 特点分析

这一阶段的国图西文编目规则虽然还会大量参考西方的编目条例,但是已经开始注重本地化的需求,逐步摆脱"拿来主义"的思维定式,对西方编目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利用,将西文编目规则的制修订与馆情紧密相连,极大地促进了西文编目工作的发展。

(1)在本地化规则方面不断探索。尽管国图西文编目工作开始较早,但一直"照搬"美国规则。新中国成立后,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西文编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文编目工作快速发展的需求催生了诸多更具操作性的本地规则。

(2)标准化水平显著提升。这一时期,国图以本地规则的形式对美国编目规则中的矛盾之处以及具体做法进行了统一,从而大大提升了编目工作的标准化程度。但是,对各语种规则的统一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当时的编目环境下,对不同语种著录条例的集成只是形式上的合并,并没有在内容层面实现有机融合,因此规则的使用存在诸多不便。

(3)规范控制思想初现。虽然当时囿于条件限制,没有形成独立的规范文档,但著录条例中关于标目形式的规定以及编制"参见片"的要求,还是体现了规范控制思想的萌芽。

尽管如此,本地化规则的编制水平仍有待提高。例如,1961 年出版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仍基本参照美国的条例,甚至规定中国人名的标目形式都采用韦氏拼音,但实际上采用汉语拼音更易操作。而在 1958 年出台的《西文图书编目暂行条例(草案)》中的规定是采用汉语拼音著录附注项,如"参考书目"著录为"CanKao Shumu","重印本"记录为"Chongyinben",显然这对于西文图书的著录是不科学的。可见,当时的本地规则在需要突出本地化特色的地方没有予以规定,而有些本地规定又过于随意草率,不切实际。

这一阶段,国图西文编目工作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与发展,相关规则的制定也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尽管本地规则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对于西文编目规则的进一步完善还是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3 停滞阶段——蓄势待发(1966—1976)

"文化大革命"使国图刚刚有所起色的西文编目工作陷入了停顿,而此时国际编目界的发展却日新月异。在 1961 年巴黎《原则声明》所倡导的"国际编目统一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精神指引下,一系列国际编目标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67 年,《英美编目条例》(*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AACR)正式出版,史称"AACR1",1978 年颁布第二版,即著名的"AACR2",此后一系列修订版被称为"AACR2R"。1971 年,《国际标准书目著录(专著)》〔ISBD(M)〕作为 ISBD 家族的第一个标准诞生,此后 ISBD 总则以及针对各资料类型的多个分则相继颁布,逐步形成了体系完整的标准家族。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电子计算机开始应用于编目工作,机读目录(Machine Readable Catalog, MARC)应运而生。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面对大量涌现的文献信息,为了解决文献剧增和有效利用之间的矛盾,编目界试图建立一种国际化的编目体系,构建一种全球范围的文献信息控制系统,即"世界书目控制"(Universal Bibliographical Control, UBC)。该术语由西德巴伐利亚图书馆馆长卡特瓦瑟于 1971 年提出,其内容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出版物完整、准确、及时地记录与检索;世界范围内书目控制的组织、协调与合作;世界范围内书目控制的标准化、自动化与网络化[2](68)。这一思想很快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和成果:1973 年的第 39 届 IFLA 大会将 UBC 列入 IFLA 的第一项核心计划;1974 年

的第40届IFLA大会通过了与UBC相配合的世界出版物共享计划;各国国家书目大力发展;1976年IFLA完成国际通用机读格式即UNI MARC的研制等。与此同时,国际编目网络事业起步并发展迅速,在集中编目和合作编目的基础上采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手段使编目工作的社会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国际编目工作发展如火如荼之时,国图西文编目工作却几近停滞,对国际编目条例的研究与应用更是难以顾及。虽然在编目条例方面没有进展,但国图在分类标引规则的制定方面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71年,《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工作重新启动,并被命名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该分类法的编制始于1959年,由北京图书馆牵头,但是当时未能完成。重启编制工作的两年后,《中图法(试用本)》印行并陆续为全国各类图书馆所采用,并于1975年正式出版。《中图法》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大型图书馆的图书分类问题,也为中小型图书馆的图书编目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4 初步繁荣阶段——创新思维下的深刻变革(20世纪80、90年代)

4.1 西文编目规则顺应自动化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项事业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为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和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我国西文编目工作开始积极研究国际编目规则的发展变化,力求摆脱停滞不前的落后局面,推进文献著录规范化、标准化。在这个过程中,西文编目规则的制订深受编目工作自动化的影响。

4.1.1 《北京图书馆西、俄文图书编目条例》(1984)

进入20世纪8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目部组织编写了《北京图书馆西、俄文图书编目条例》,以期解决近二十年没有修订外文编目条例的问题。该条例分为西文和俄文两部分,均为图书著录条例。其中西文部分基本参照1961年出版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但增加了按ISBD(M)著录卡片目录格式的说明,第一次较全面地介绍了著录标识符的使用,为编目工作者了解和掌握ISBD提供了便利。尽管本条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今后的图书馆工作自动化及采用ISBD创造条件[6],但该条例的制定仍处于我国图书馆以卡片目录为主流的大背景下,其中的样例均为卡片形式,内容结构均与之前编目条例没有太大差异,未能全面体现国际编目条例的发展变化。

4.1.2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1985)

1983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和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共同举办"西文编目标准化和自动化研讨会",这是我国西文编目工作由传统编目迈向现代化编目的重要转折点[7],会议决定我国西文编目应积极采用AACR2和相关的国际标准(ISBD),尽快编制我国的西文文献著录规则[8]。北京图书馆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规则的制定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于1985年付梓出版。该条例可谓是AACR2在我国的本地化产品,奠定了之后近三十年(2010年RDA正式发布,我国图书馆界陆续采用)我国西文编目条例的基础。该条例与以往规则相比有着较大变化:(1)改变了以往"重标目、轻著录"的做法,对著录项目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第一次按ISBD规定了著录"八大项";(2)样例中基本不再出现卡片格式,第一次出现了机读目录格式;(3)文献类型大大丰富,除图书外还有测绘制图资料、缩微复制品、影片和录像资料等,针对不同类型文献的规定在各著录项目处予以特殊说明;(4)将标目的选取和标目的构建分设为独立的章节,内容更为丰富,阐述更为清晰;(5)本地化特色凸显,特别是在中国人名、中国地名、中国作品名等名称标目方面加强了对汉语拼音的使用;(6)规范控制思想趋于成熟,如第6章"参照"较详细地规定了各类参照片的著录格式,这可看作是规范记录的原始形态。《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问世对我国西文文献著录标准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入90年代时,全国大中型图书馆基本都采用了该条例,实现了西文文献著录的标准化,为我国计算机编目打下了坚实基础[7]。

4.2 特点分析

这一阶段是西文编目从恢复性发展到初步繁荣的时期。在“世界书目控制”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我国编目界更加积极地关注国际编目工作的进展,并将国际编目规则与国情、馆情有机结合,形成了科学合理的本地化编目规则。为与知识发展保持同步,及时解决实际应用中的各种问题,《中图法》自 1975 年首次颁布以后不断修订,至今已推出了五版,在保持整体稳定的基础上,有选择地修订部分大类及类目划分等,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学科、新事物、新主题的分类需求。此外,这一时期,我国编目界已认识到在自动化方面与国际同行的差距,因此开始从西文编目入手加强对机读目录格式的研究。1986 年,北京图书馆自动化工作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和维护外文书目数据库和规范数据控制系统[1](295)。20 世纪 90 年代,西文图书编目组在我国率先尝试计算机编目,尽管受技术条件限制发展缓慢,但对自动化发展趋势的充分认识已经及时体现到编目条例的修订中。国图西文编目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成果丰硕,影响深远。《西文文献著录条例》是这一阶段我国西文编目工作的最重要研究成果,使得我国西文编目规则的研究及制定在停滞近二十年后再一次与国际接轨,并成为之后近三十年编目规则制修订的基础。

(2)本地化规则逐步完善。这一阶段的编目规则在遵循国际标准的同时明确了一些符合本地特色的规定,如加强了汉语拼音在中国名称标目中的使用,附录部分增加了各种语言文字的语言特点、常用冠词、连词形式等内容以方便本地编目员使用等。此外,这一阶段西文图书采用的分类排架规则改为中西结合,即分类号的分配依据各版《中图法》,书次号仍采用克特表。

(3)为编目自动化奠定基础。逐步探索并实现编目工作自动化是该时期的一大特色,在制定编目规则的过程中密切关注计算机编目的进展,力求在标准方面为实现自动化提供更多便利,如著录项目的顺序、标识符以及标目形式的规定等愈加规范、严格,同时对机读目录格式的研究也逐步启动。

(4)规范控制引起重视。尽管我国编目自动化与国际编目界存在很大差距,由此导致规范控制的落后,但所制定的本地编目规则已逐步表现出对规范控制工作的重视,特别是国图还购买了 LC 发行的缩微型规范文档。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缩微型规范文档的使用囿于阅读条件的限制,控制效果欠佳。

5 跨越式发展阶段——与国际编目界的交流互鉴(2000 年至今)

5.1 西文编目规则融入国际化浪潮

2003 年,国图正式启用 Aleph500 图书馆集成系统,这标志着国图的编目工作真正实现了自动化,所有外文资源均依托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平台开展编目工作。先进的网络环境进一步开拓了编目员的视野,与各国更为频繁的数据交换也促使国图加快国际化的步伐,增强与国际编目界的交流互鉴。

5.1.1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2003)

进入 21 世纪后,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多样,编目自动化及网络化发展迅速,国际上编目理论与实践也出现重要进展,由此导致原有编目条例难以满足编目需求[9]。2003 年,由国家图书馆牵头编写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正式出版,这是对 1985 年版《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一次全面修订。其编制体例及内容基本参照 AACR2R,与之前条例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1)编写体例变化较大,由之前的在各著录项目下设置针对特殊资料类型的著录规则,改变为在不同资料类型下规定各著录项目的著录规则;(2)内容更为丰富,著录部分由原来的两章扩展为八章,涉及的资料类型更加多样,标目部分的内容尽管仍为三章,但有许多扩充或更新;(3)明确了之前模糊的规定,例如明确和解释了主要信息源和各著录项目的规定信息源,明确了

会议录主要款目标目的选取来源等;(4)从实际出发,以及为配合 MARC21 字段的使用,增加了“著录分析”和“附加款目”的规定;(5)进一步突出本地化特色,如列举带有中文并列题名的实例,对多卷出版物的著录做出相应提示以方便国内编目员参照,对中国人名扩充细化等。

5.1.2 《资源描述与检索》的研究及本地化应用

脱胎于 AACR 的《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 RDA)是一部集编目理论和实践之大成的国际性编目规则[10](1)。它秉承“走出图书馆,走出英美世界”的理想,跨越语言屏障和载体壁垒,成为数字世界信息组织的通行标准。自 2010 年以工具套件的形式正式发布以来,RDA 在全世界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和推广。国图一方面加强对 RDA 的研习和实践,适应国际标准,以期与之无缝接驳,另一方面,还积极将 RDA 的先进理念引入国内,通过外文编目的探索,为中文编目的完善与优化提供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2012—2018 年,国图依循认识 RDA、解析 RDA 和应用 RDA 的科学规律,陆续推出了《RDA 中译本》和《RDA 全视角解读》两部专著,为 RDA 的推广普及首开先河,同时多次举办大型全国性培训,努力将 RDA 的先进理念转化为科学的编目条例。依据相关的国际经验,实施 RDA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编制适合馆情的 RDA 本地政策声明。2017 年底,《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 RDA 本地政策声明暨书目记录操作细则》(简称 NLC PS)正式出版,并于 2018 年 1 月 1 日作为国图外文编目的新规则开始使用,这标志着 RDA 在国图本地化的开启。2018 年底,Aleph500 也完成了 RDA 化的系统切换,RDA 记录在数据关联、检索点丰富和读者友好度方面的优势在 OPAC 上得以体现。鉴于国图在 RDA 研究和实践领域取得的硕果,国际 RDA 管理机构“RDA 理事会”(RDA Board)于 2017 年底正式邀请国图成为 RDA 亚洲地区国家机构代表,任期三年。

5.2 特点分析

这一阶段是西文编目从初步繁荣走向跨越式发展的时期。编目工作自动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启用 Aleph500 系统后,国图的编目工作逐渐摆脱了单机环境下的各种弊端,系统化的规范控制工作也得以开展。

(1)内容规则与格式规则相得益彰。这一时期,国图对 AACR2、ISBD、RDA 等内容规则的研究不断深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以 MARC21 为代表的格式规则的探讨。2003 年,国图启动了 MARC21 数据格式的翻译及研究工作,两年后出版的《MARC21 书目数据格式使用手册》和《MARC21 规范数据格式使用手册》成为西文编目工作的实用参考工具书。

(2)愈加适应数字化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编目自动化平台日益完善,以数字资源为代表的各类新型资源不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适应数字化环境的发展成为编目条例制修订关注的重要方面。国图所采用的 RDA 正是将自己定义为数字世界通行的编目标准,其内涵可理解为,RDA 能提供所有类型资源编目的规则,尤其是数字资源;RDA 能应用于数字环境;RDA 本身就是基于网络的工具,而传统编目规则仅针对印刷型的产品[10](6)。

(3)建立了较完善的规范控制系统。Aleph500 系统的启用及 LC 规范数据库的引进,使规范控制成为国图西文编目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该时期,国图西文编目工作规范控制的流程和规范库的更新机制等都得以明确,规范控制的顺利开展大幅提升了西文书目数据库的建设质量。

(4)与国际编目界的交流互鉴逐步加强。RDA 的本地化实施向国际编目界表明了国图推动编目事业国际化的姿态和决心,相关研究和实践获得了 RDA 理事会的高度肯定,国图由此成为 RDA 亚洲地区国家机构代表,这极大地提升了国图乃至我国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影响力,为今后更多更好地参与国际图书馆事务、增加话语权、表达亚洲意志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6 未来发展阶段——国际化与民族化的深度融合

纵观国图西文编目规则的百余年演变历程,

它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国际先进编目理论与实践经验,同时又以主人翁的冷静思考国际先进成果的本地化。可以说,百余年的发展史既是积极追求国际化的历史,又是始终坚守民族化的历史。诚然,编目规则绝非一成不变,新时代下国际编目界不断推陈出新,国图仍肩负关注国际编目规则变化,推动我国编目事业发展之重任。

1998 年,IFLA 发布了《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al Records*, FRBR)以确立国家级记录的"基本要求"。在其影响下,《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 FRAD)和《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 FRSAD)随后产生,三者均以"实体-关系"(Entity-Relationship)为框架建立模型,将对书目领域的研究延伸至规范控制领域,由此构成了彼此补充、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概念模型家族"[11]。然而,考虑到其中存在的术语定义矛盾,实体、属性、用户任务彼此交织,三个模型使用不便等问题,作为 RDA 编制思想基础的 FR 概念模型家族发生重要变化,三模型的统一版——IFLA 图书馆参考模型(IFLA Library Reference Model, IFLA LRM)于 2017 年诞生。为了将 IFLA LRM 的最新思想引入 RDA,同时解决 RDA 工具包面世 10 年来积累的各种界面问题,RDA 指导委员会(RDA Steering Committee, RSC)牵头开展了 RDA 重构和再设计项目——3R(RDA Toolkit Restructure and Redesign, 3R)项目,目标就是在重新设计的新版工具套件界面上推出内容经过修订的新版 RDA[12]。该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8 年 6 月 13 日推出新版 RDA 工具包测试版。而对于刚刚正式实施 RDA 的国图西文编目工作来说,RDA 的重大变化势必会引发本地编目规则修订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作为 RDA 理事会亚洲地区机构代表,国图应该担负起协调亚洲地区 RDA 实施以及加强亚洲与国际编目界沟通联络的使命,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推动我国编目工作国际化与民族化的深度融合。而在外文编目实施 RDA 的基础上,探讨中文文献编目引入 RDA 的路径,也是国图编目工作者必须面对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2 高红.编目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3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编辑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124-1145.

4 北京图书馆图书著录条例(草案)油印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1959:1.

5 阎立中.《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出版和西文编目工作的展望[J].图书馆学通讯,1986(1):46-48.

6 北京图书馆编目部.北京图书馆西、俄文图书编目条例[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

7 林明.我国西文编目工作的一件大事——修订《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回顾[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4(1):16-20.

8 中国图书馆学会《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编辑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M].北京:中国图书馆学会,1985:3.

9 中国图书馆学会《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3

10 罗翀.RDA 全视角解读[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11 蔡丹,罗翀.从 FRBR LRM 到 IFLA LRM[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8(5):52-58.

12 王薇,罗翀.3R 项目进展及国家图书馆 RDA 本地化实施的应对策略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8(5):107-112.

(蔡　丹　副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罗　翀　研究馆员　国家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9-06-05